

“积淀说”的传承与革新

——纪念李泽厚先生

杨泽波

摘要:受李泽厚“积淀说”的启发,我提出了自己“结晶说”,但二者又不完全相同。“积淀说”的重点是分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从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角度概括中国文化的特征;“结晶说”则主要是以“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对孟子性善论进行理论的说明。这一差别决定了我与李泽厚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也颇为不同。李泽厚提出“情本体”,目的是要打掉本体,我则强调仁性作为道德本体,其本质是伦理心境,伦理心境必然包含情感,从而力保道德本体不失。李泽厚提出“举孟旗,行荀学”的口号,思想偏向向了荀子一边,而我坚守三分法,强调仁性和智性都是道德根据,不再偏向哪一个方面,不再分判正宗与旁出。

关键词:“积淀说”;“结晶说”;李泽厚;“三分法”

作者简介:杨泽波,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济南 250100)、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特征,与这个特征相对应,在思想界都有领军人物,他们肩抗大旗冲在前面,引领着千军万马,代表着那个年代,代表着那段精神。在中国哲学史界,20世纪20年代的胡适,40年代的冯友兰,60年代的侯外庐,皆是其例。上述人物的地位或有争议,但说李泽厚是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人物,相信很少有不同的意见。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一个令人特别怀念的年代。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国门刚刚打开,外面缤纷多彩的世界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撕破了禁锢在人们心灵上的那张沉重的网,人心一下子就活了,就有血色了。思想界也是一样,人们开始总结历史教训,开始检讨旧的范式,开始探讨新的方法,精神高度亢奋,姿态极为积极,蕴藏在内心的巨大能量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喷薄而出,源源不绝。

我那时还在部队工作,刚刚有机会以同等学历报考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跟随潘富恩学习。读研碰到的最大困难不是外语问题,不是材料问题,而是方法问题。通行了几十年的旧方法不行了,但新的方法是什么,心里又不清楚,十分迷茫。那个时候最大的好处是开始有机会广泛接触海外新儒家的著作,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我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终于明白,之前走的路全错了,中国哲学原来是可以这样做的,我很快投入到了现代新儒家的怀抱。但不久,我又发现他们的方法也有问题,仍然没有摆脱西方哲学的套路。什么是好的方法?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方法?这个问题一直深深困扰着自己。

这时,李泽厚对我起到了引领作用,而契机是他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孔子再评价》。这篇文章的特殊之处,是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研究孔子,认为孔子以

仁释礼,将社会外在的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奠定了根基,而仁包含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相互制约,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精神特征就是实用理性。这篇文章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固有套路,方法新颖,读来耳目一新。

李泽厚这篇文章能够有此功力,完全得益于他在美学研究中创建的“积淀说”。李泽厚认为,不是个人的情感、意识、思想、意志创造了美,而是人类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创造了美,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生产活动才是美的真正根源,美是历史的积淀。在将研究的重点扩展到中国哲学后,他将这种方法也移植了过来,着重从人类总体社会实践的角度研究儒家的思想,提出了文化—心理结构这一核心概念。李泽厚对此有清楚的自觉意识,将用于美学研究的方法称为“狭义积淀说”,而将用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方法称为“广义积淀说”。

李泽厚这篇文章深深启发了我:既然可以用“积淀说”研究中国文化,为什么不能仿照这个思路解说孟子之良心呢?我从事儒学研究的第一个项目是孟子。性善论是孟子的伟大创造,按照他的讲法,人之所以有善性是因为人有良心,而良心“我固有之”,是“天之所与我者”。孟子这个说法延续了两千多年,很少有人提出怀疑。而按照我的理解,人之所以有良心,首先是因为人天生具有一种“生长倾向”,这种倾向就相当于孟子说的“才”。因为“生长倾向”是天生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天之所与我者”。就此而言,孟子是对的。但“生长倾向”只是良心的底子,良心的主体部分来自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的影响,是这种影响在内心里的一种结晶物,我将这种结晶物称为“伦理心境”。孟子建立性善论,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只看到了前者,没有看到后者。我们作为后来人应将后者补上,而这也正是我几十年来不断努力的方向。我坚持认为,要对良心加以说明,一个是“生长倾向”,一个是“伦理心境”,二者缺一不可。“伦理心境”必须建立在“生长倾向”的基础之上,而“生长倾向”在社会生活中也一定会发展为“伦理心境”。二者不能分离,只是一本,不是二本。

明眼人一望即知,我的孟子研究明显受到了“积淀说”的影响,但我与李泽厚又有不同。“积淀说”的重点在于分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以说明中国文化何以如此不同,而我则主要是对性善论加以理论的诠释,以说明人为什么有良心,有善性。我没有像李泽厚那样讨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角度概括中国文化的特征,李泽厚也没有像我这样从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两个方面对孟子的性善论进行系统的理论说明。为了彰显这种不同,我将自己的这种做法叫做“结晶说”,以区别于李泽厚的“积淀说”。

因为“结晶说”脱胎于“积淀说”,而学界很多人并不理解李泽厚的思想,“结晶说”也受到了诸多质疑。其中一个重要理据,便是批评我是经验主义,哲学起点偏低。为此,我曾撰文《经验抑或先验:儒家生生伦理学的一个自我辩护》(《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2期)为自己申辩,强调我的立场不是经验主义。因为我解说良心首先讲一个“生长倾向”,这不是出于经验的概括,而是源于缜密的哲学分析。我的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内觉”,是“我觉故我在”,而不是经验。“生长倾向”是通过“内觉”发现自己的良心后,借助智性一点点推出来的,不是源于经验的归纳。更为重要的是,“伦理心境”虽然来自于经验,但作为道德根据,它并不是经验本身,而是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在内心里的一种结晶物,这种结晶物在处理伦理道德问题之前已经存在了,有着明显的先在性。这就是我所说的“后天而先在”。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涉及如何看待经验和先验的关系问题。李泽厚晚年将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三句话:“由历史建成的理性,由经验变成的先验,由心理形成的本体。”这其中“由经验变成的先验”最为重要,“后天而先在”即与此相关,它

告诉我们,经验可以变为先验,后天可以变为先在。然而,不少人固守于传统的模式,不了解这个道理,无法将经验与先验沟通起来,乃至指责李泽厚缺少对西方哲学的基本了解。其实,这些批评者不明白,李泽厚这样做并不是缺乏这方面的常识,而是他的方法太超前了。批评者远远落在了他的后面,难望其项背,自然无法了解他的思想,只能对其加以指责了。

因为李泽厚对我有重要影响,所以我一直比较关注其思想后来的走向。非常可惜,我发现,李泽厚后来的思想与我的差异越来越大。比如,李泽厚特别重视情,强调在其历史本体论中,“情理结构”是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一“情理结构”中,情与理以特殊的方式、比例、关系、韵律而相关联、渗透、交叉、重叠,相关的理论即为“情本论”。重视情的问题,固然有其合理处,但李泽厚建立“情本体”的根本目的是要打掉本体,不要本体。这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又如,李泽厚不赞成牟宗三定朱子为旁出,认为孟子、阳明才是“别子为宗”。这种看法我也不赞成。我在《仍是一偏:评李泽厚的新旁出说——我与李泽厚的分别之二》(《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中讲过,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认为,自孔子建立儒学以来,其思想内部与道德根据相关的一直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礼,一个是仁。孟子和荀子分别顺着仁的路线和礼的路线发展,都有自己的根据,但谁也不能代表正宗,指责别人是旁出。李泽厚提出“举孟旗,行荀学”的主张,表面看两个方面都讲了,但重心实是偏向荀子一边,对孟子一系的理解不够到位。

由此说来,我与李泽厚的区别说到底还是思想方法不同。多年来,我依据孔子的思想特点,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这就是三分法,并把它作为我近来建构的儒家生生伦理学(详见杨泽波:《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的核心。按照这种方法,孔子思想内部共有智性、仁性、欲性三个部分,其中除欲性外,智性和仁性都是道德的根据。有了三分法,我们很容易明白,儒家特别重视情的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仁性包含着丰富的情感。因此,情未必要归于感性,即使是“新感性”,而强调情的重要也未必一定要打掉本体。另外,有了三分法,我们也可以明白,无论是孟子还是荀子,都是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孟子一系发展了仁性,荀子一系发展了智性,这两系都有各自的贡献,也都有各自的问题,不应分什么正宗与旁出。如果一定要分正宗的话,那么这个正宗只有一个,它就是孔子,其他人物,都有缺失,都是一偏。在孔子思想架构上综合孟子与荀子,是题中应有之义,大势所趋,不必事前为争正宗与旁出而大费周张。

尽管我的方法与李泽厚有这些不同,但我的思想受益于李泽厚,“结晶说”由“积淀说”脱胎而来,这一点是必须公开承认的。《“积淀说”与“结晶说”之同异——李泽厚对我的影响及我与李泽厚的不同》(《文史哲》2019年第5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好地表达了我的这一用心:“我三十多年来坚持以伦理心境解读性善论最初就是受到了李泽厚的影响。平心而论,环顾四周,在中国哲学范围内,迄今为止,我可能是唯一沿着这个方向努力并具有自觉意识的学者了。”学界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李泽厚学生很多,弟子很少,意思是说,他带过的研究生很多,但能够真正跟上他思路的非常少。据与李泽厚交往密切的陈明讲,李泽厚对此似乎也颇为无奈,乃至有“你们按照我的路子走可以走得很远,但你们偏不,迟早会后悔”的感叹。因为我的经历比较特殊,出道大大晚于我的同龄人,与李泽厚没有直接的交往,只是在一些会议上见过面而已。但我的“结晶说”脱胎于李泽厚的“积淀说”,沿着这个路子走,将李泽厚的这一思想传承下来,发扬光大,则是我深切希望的。在李泽厚逝去的特殊日子,讲述这个背景,理清这个关系,算是对李泽厚的一种纪念吧。

(责任编辑:郝鑫李梅)

intellectual orientation of the bamboo slip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school of thought, were broadly followed in academic circles. When toward the end of his life he proposed “raising Mencius’s flag while proceeding with the study of Xunzi (*ju Meng qi, xing Xun xue* 举孟旗,行荀学), this also led to wide discussions in the academic world, facilitating the research of Xunzi’s thought. Deeply mourning Li’s passing,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memorizes the friendship they had,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he received from him.

Keywords: Li Zehou; Western values aided by Chinese ideas; Mou Zongsan; Zisi-Mencius school of thought; Xunzi; Inheritance from Mencius and Xunzi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Accumulation Theory”: In Memory of Mr. Li Zehou

Yang Zebo

Abstract: Inspired by Li Zehou’s “accumulation theory” (*jidianshuo* 积淀说), I propose my own “crystallization theory” (*jiejingshuo* 结晶说),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ccumulation theory focuses on the deep structur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actical reason and hedonic culture. Crystallization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uses “developmental tendency” (*shengzhang qingxiang* 生长倾向) and “ethical mentality” (*lunli xinjing* 伦理心境) to provide further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Mencius’s theory of the good of human nature. This difference determines that my views on some major issue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Li Zehou. Li Zehou proposes “emotional ontology” (*qingbenti* 情本体) with the aim of discarding ontology, while I emphasize the essence of “*renxing* 仁性” is an ethical mentality, which necessarily contains emotions and strives to keep the moral ontology intact. Li Zehou’s slogan “Raising the flag of Mencius, while practicing the Xunzi’s learning” (*ju Meng qi, xing Xun xue* 举孟旗,行荀学), is biased in favor of Xunzi, while I insist on a trichotomy, emphasizing that both “*renxing*” and “*zhixing*” are the basis of morality, no longer favoring one side or the other, and no longe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orthodoxy and heterodoxy.

Keywords: accumulation theory; crystallization theory; Li Zehou; trichotomy

Going His Own Way: The Word’s and China’s Li Zehou

Liu Yuedi

Abstract: Li Zehou was a philosophical thinker who went his own way. He began to study Tan Sitong’s and Kang Youwei’s thought when he was in university. In the early 1950s, he participated in the “major debate on aesthetics” (*meixue dataolun* 美学大讨论). In 1979, he publishe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philosophy: *The Critique of Critical Philosophy* (*Pipanzhexue de pipan* 批判哲学的批判), and subsequently his book *The History of Beauty* (*Mei de licheng* 美的历程) became popular. He then put forward the novel 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al ontology” (*qingbenti* 情本体), to finally focus on the study of “ethics” (*lunlixue* 伦理学) in his later years. From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 Zehou’s thought,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volution of his thought always kept pace with changes of the times. As such, he became a philosopher who could integrat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nd a thinker who could integrate substance and function.

Keywords: Li Zehou; emotional noumenon;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e